

抗日战争研究

KANGRI ZHANZHE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报刊

1

1994

封面设计 马晓光

需购《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1992年、1993年各期者，请与本刊编辑部（地址见封二）联系，共10期25元，另加邮资5元。

抗 日 战 争 研 究

1994年第1期

出 版 者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印 刷 者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邮发代号：82—47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 外 代 号 Q18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刊号 ISSN1002—9575

NO11—2890/K

国内定价3.50元

抗日战争研究(季刊)

1994年第1期 总第11期

目 录

应当重视抗战时期陪都史的研究 ——在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金冲及(1)
千万不能忘记中国抗日御侮有血有泪的历史 ——向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研讨会提交的 书面发言	[美]陈香梅(4)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牟敏昌(7)
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	贺新城(12)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石柏林(25)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曾瑞炎(42)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曾业英(70)
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	张利民(84)
抗战中的中国铁路运输	李占才(99)
陕西公路运输在抗战中的作用	田 霞(115)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董志勇(124)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特务入藏记	房建昌(147)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 史料选译	吴景平译(157)

盟国商讨反攻缅甸方案中的矛盾与冲突…………… 方世凤(174)

· 讨论篇 ·

关于日军编制和军衔译名问题的讨论

…………… 高 培 干前进 邹念之 张振鸥
俞辛焯 汤重南 徐 焰 荣维木(187)

· 书评 ·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

——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俞辛焯 祁建民(213)
《八路军》史料丛书述评…………… 马仲廉(222)

· 抗战时期报刊介绍 ·

《救国时报》介绍…………… 林全民(230)

· 抗日战争纪念地纪念馆 ·

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及抗战遗址…………… 耿德铭(243)

· 书讯 ·

《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长城察绥抗战》…………… (251)

作者来信 …………… (83)

本期英文目录…………… (253)

图片 …………… 封三

本期出版时间 1994年2月26日

应当重视抗战时期陪都史的研究

——在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金冲及

最近十来年，国内学术界对抗战研究取得了比以往许多年更为明显的成绩：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回忆录和专题资料；举行过九一八事变、敌后抗日根据地、台儿庄战役等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还出版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等。而研究抗日战争史，如果不深入研究当时作为陪都重庆的历史，这个研究是不完整的。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它的这种地位，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初期。如果说，在这以前和这以后重庆是一个地区性的中心城市；那末，在这段时间内，重庆发生的种种事情，对中国来说，便有着全局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就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1938年武汉失陷后，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重庆。1940年9月6日，正式确定重庆为陪都。这件事做得好，在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它向国内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外来强暴面前建立起一个能够指挥广大正面战场作战的中枢。迁都，是要有很大决心的。我们只要作一点历史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一大批爱国志士发动“公车上书”，向清政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之一是“迁

都”，但清政府就无法做到，甲午战争很快以中国的“城下之盟”而告终。第二次是相隔三四十年后的抗日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当然，那时的国内外环境同上一次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断然将战时首都迁到重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在抗战初期起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由于重庆是当时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所在地，各友好国家对中国的支援大多通过这里来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盟国在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外国记者和一些对中国抗战抱着同情态度的友好人士纷纷来到重庆，中国的信息从重庆通过种种渠道迅速传往海外，又使重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城市，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

从民众方面来看，随着沿海富庶地区的相继沦陷，许多不愿充当日本顺民的中国人，不辞千辛万苦，不畏颠沛流离，从全国各地涌到重庆，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大迁移。几百家民族工业，为了支持抗战，报效祖国，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克服沿途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历尽艰险，将大量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从沿海迁到内地。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抗战初期，重庆的工厂数字占整个大后方的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民族工业大迁移给予的资助和安排是功不可没的。这场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业大迁移，在经济上对支持抗战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以后西南的经济发展也打下了重要基础。

文化上也是这样。抗战开始后，高等学校迁入重庆和它附近的有三四十所，包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还有许多文化团体、科学研究单位和新闻机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储存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著名的文化人集中在郭沫若为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里。他们在十分清贫和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一大批重要的学

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真可以说是极一时之盛。

重庆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当时国共之间虽有摩擦，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虽已日益增加，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毕竟没有破裂，国共合作仍保持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鼓吹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在大后方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广交朋友，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共同推进爱国民主运动，在共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又在这里先后举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些都为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陪都史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它的前期和后期又有变化。大体而言，在抗战初期，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总的讲还比较好，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透露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息。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抗战仍在继续，但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空气明显恶化，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等被逼离开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外贸易和国外援助的通道几近断绝，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垄断资本的活动趁机日益猖獗，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艰难。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的千里大溃退，激起了大后方人心的巨大变化。在战争年代里，军事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这次大溃退，又正发生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原来日趋尖锐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出来，更加使人感到难以忍受。大后方的工业生产也在这一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陷于苦苦挣扎、奄奄一息的境地。根本改变现状，开始成为人们普遍而强烈的要求。这种人心的大变动，发生在抗日战争行将胜利的历史时刻，对以后历史的演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些，也是十分值得重视和需要深入研究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千万不能忘记中国抗日御侮有血有泪的历史

——向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美)陈香梅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10月19日至10月22日在中国重庆大学举行。我本应到会,和各位学者专家们共聚一堂,重温历史,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为中国年轻的一代,为国际的史学家们做些印证,留些研究的资料。非常抱歉,我因公事要到北京开会,而且是带了美国最大的、最有声望的大众传播和公关公司的董事到北京去签订投资合约,双方在北京订了会谈日期,我为了促成这项工作,只好放弃到重庆的良机。非常抱歉。这是我的损失,只好说一句:后会有期。

我非常高兴,这个富有历史价值的研讨会在抗战时期的陪都召开,这不但表明山城重庆对大家具有浓厚的吸引力,同时,陪都重庆也确实留下了可供考察和追忆的众多抗战遗迹。

中国抗日战争已过去逾半个世纪了。亲身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同胞们,来华协助中国抗日的美国战士,至今仍无法平抑心中的深刻伤痛。很可惜,如今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后来人,对中华民族这段血与泪的史迹却缺乏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今天大家在重庆共聚一堂,实在任务深远。我们要把这段惊心动魄的史迹公诸世人,让世人更清楚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日本于百年前即对中国有野心。“九一八”事件使中国的东北全部沦入日本手中。1939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全中国抗日战争启开了序幕。所有中华儿女,包括海外同胞,不分民族,不分阶层,不分地域,在近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进行了一场惊心动

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这场战争不但挽救了中华民族，更显示了炎黄子孙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并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抗战八年，我一直是流亡学生，我随家人自古都北平逃到香港人小学和中学。

珍珠港事件后，香港于1941年12月25日（即西方的圣诞节）沦陷。我和姐妹们又随着学校迁入抗日的大后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唱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苦守东战场……”“一寸山河一滴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爹娘……”多么豪壮，多么悲愤。真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的纳粹德国投降，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也跟着投降。以色列人民对于犹太人被纳粹党徒的迫害，五六十年不断地有画册、书本、影片、电视剧作详细的纪录，以免悲剧重演。但中国人对抗战战争的史实以广泛的、客观的态度来加以收集整理、编撰及出版、宣传等工作，与欧战纪录相比，实嫌不足。日本竟有人在改写历史，若中国人只忙于自相残害，那么中国人未来的命运何去何从，中国人未来走哪一条大道，值得我们沉思与反省。

我现在虽已是美国公民，而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二三十年来已因自己努力奋斗进入主流社会，但无时无刻不以祖国的安危，祖国的未来为己任。中国今日经济增长，也力求科技进步，但千万不能忘记中国有血有泪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往前走的勇气。

我的先夫是美国飞虎队的将领陈纳德将军。他于1937年即到中国来协助中国抗日，并组织了美国的空军志愿队，名曰“飞虎队”。在抗战的陪都重庆和云南的昆明建立了大本营，以一敌十来击败日本对中国后方城市的疯狂轰炸。陪都重庆得以坚守，飞虎队之功不可磨灭。只因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国民党的委员长（当年中

美合作的伙伴)合作而被共产党的史书忽略,这对中美当年共同抗日的精神是不公道的。最近许多史书都已为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诗做平反工作,我很高兴。在美国,民众公认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英雄是艾森豪元帅(后来于1956年做了美国总统),在亚洲的英雄是陈纳德将军。1990年出了艾森豪将军邮票、陈纳德将军邮票首日封。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做点深入工作。因为海峡两岸分离甚久,现在经过我做了铺路工作而有了交往,我也甚引以为荣,为慰,这方面也望大家继续努力。

我虽然不能和大家在一起讨论研究,但我知道这项工作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始。30年代40年代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党派,不分彼此,同心合力抗日御侮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当政者能再来一次大合作,把中国人带到繁荣强盛的明天。我向大家敬礼!

1993年10月5日于华府

(作者单位: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牟敏昌

由重庆市 10 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的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993 年 10 月 20—22 日在重庆大学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大陆和台湾及美国、日本的史学专家、学者 60 余人。会上交流论文 50 余篇,专著两本。

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宗旨,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挥中国抗战陪都重庆的历史文化优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抗战历史的研究,加强陪都遗址保护,同时促进重庆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学者们研讨的内容为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至 1946 年 5 月还都南京这个时间,陪都重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情况。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重庆市人民政府窦瑞华副市长和会议东道主重庆大学校长吴云鹏教授分别致欢迎辞;研讨会主席、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书记顾乐观教授就陪都重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讨会的宗旨和范围等问题作了讲话。大会宣读了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的书面发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书赠大会的题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扬中华爱国主义传统”。著名历史学家李新教授的代表朗诵了李教授为这次研讨会写的贺诗。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向会议发了贺信。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金冲及教授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的主题,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考察了陪都遗址,参观了美国飞虎队十四航空队援华抗战展览和重庆钢铁(集团)公司。

与会学者感到,这次研讨会思想活跃,中外学者交流了学术,增进了友谊,为进一步研究抗战陪都历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将会议研讨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 关于陪都重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

会议有4篇论文和4人发言阐述了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们指出,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的中心,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设在重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心。重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城市,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国际名城齐名,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有人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陪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光荣的一页”,“不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就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今天重庆成为西南工业重镇,跻身全国八大城市之一,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之一,追本溯源,源于陪都时打下的基础”。还有人指出:抗战陪都史研究要以国民政府迁渝至胜利还都的整个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这一历史时期陪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中心的形成过程、发展概况和深远影响;要突出反映重庆是中国抗战的司令部和同盟国远东战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历史地位及重大作用;特别要表现广大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民族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二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

会议有3篇论文和3人发言论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海峡两岸与会学者都认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有的台湾学者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是抗战所以能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国共两党当时继续内战而无法合作的话,日本可以继续用‘蚕食’的方法侵占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抗日战争。”有的大陆学者说:“陪都重庆,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立了一个大功的历史见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峡两岸与会学者都认为,过去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评价都不够全面,现在双方开始有了共识,应该尊重客观历史,全面地评价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三 关于民族工业内迁问题

会议有4篇论文、两人发言论述民族工业内迁。他们指出,抗战时期,东南沿海、沿江大批民族工业内迁重庆、四川等地,为从物质上支持抗战起了巨大作用,为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的学者指出,抗战初期,几百家民族工业,为了支持抗战,报效祖国,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克服沿途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险,将大量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从沿海迁到内地。这种情景是十分动人的。抗战期间,重庆的工厂数字占整个大后方的三分之一。这场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业大迁移,在经济上对支持抗战起了巨大作用,也为以后西南的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有的学者指出,民族工业内迁的贡献是:(一)保存了经济实力。从沿海地区内迁的400余家厂矿都是实力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的重要企业。其中机器业占40.4%,纺织业占21.7%,化学工

业占 12.5%，电器占 6.5%，钢铁占 0.24%，食品占 4.9%，基本上保存了中国经济的基础骨干力量，为大后方的工业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为后方经济增添了有生力量。据统计，迁到重庆的工厂共 250 家，重庆地区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区。到 1940 年，重庆拥有 159 家机械厂，17 家冶炼厂，23 家电力厂，120 家化学厂，62 家纺织厂，其他行业 40 家，共 429 家，是大后方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在内迁工厂带动下，大后方工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到 1942 年，大后方工业企业已达 3758 家，各个行业生产能力都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三)增强军需民用产品供应，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四)内迁工厂给大后方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众多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充实了后方工业技术力量。

会上还有个别论文对抗战时期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有所论及。

四 关于陪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问题

会议有 4 篇论文、两人发言介绍陪都的文化教育与科技情况。抗战开始后，有三四十所大专院校迁入重庆及其附近地区，许多文化团体、科研单位和新闻机构也迁入陪都重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集中在郭沫若为首的文工会里。他们在十分清贫和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如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剧本《屈原》、《孔雀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茅盾的小说《腐蚀》；阳翰笙的剧本《天国春秋》等，可谓极一时之盛。有些学者认为：抗战时期陪都的文艺活动，最活跃的是戏剧和美术。1941 年到 1945 年的“重庆雾季公演”，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为抗日救亡、培养戏剧精英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戏剧的光辉将与重庆同在。陪都美术界一时群英荟萃，力量大增，美术团体量多人众，美

术作品如雨后春笋,美术展览也颇为频繁,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有的学者指出,抗战时期中国科技界的精英云集陪都重庆,使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陪都科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为:(一)重视应用学科,满足战时军需民用的特殊需求;(二)注重实地调查。战争迫使广大科学工作者走出书斋,面向实际,实地考察,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科学风尚。(三)注重学科间的横向联合,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设备及资料,合作攻关,解决战时军需民用的种种课题。

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只有重庆大学提供了一篇论文和大会发言,介绍了该校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此次研讨会对战时大后方的教育研讨不够。

五 关于日机轰炸陪都重庆问题

有3篇论文,1人发言论述了日本侵略者对陪都重庆的狂轰滥炸,时间长达4年之久,先后共72次。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还有1940年5月至10月连续6个月的轰炸。1941年6月5日的轰炸造成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陪都重庆是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烈的城市。日机狂轰滥炸陪都的企图是:破坏中国大后方的经济,摧垮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但在日机战略轰炸面前,陪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地开展了反空袭斗争;成立重庆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反空袭斗争;动员一切力量利用山城有利地形,修筑防空隧道,挖防空洞、防空壕或避难室;动员民众救伤恤难和疏散,参加空袭防护队、救护队等组织。陪都人民的反空袭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粉碎了敌人妄图摧毁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阴谋,表现了大后方和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

贺新城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中国抗日救亡斗争与国内统一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一个需要探讨的深层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 对统一是抗日前提的共识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克服这场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救亡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对外的民族解放战争,总目标是驱逐日寇出中国。然而,30年代中国的国内状况决定了在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立刻发动全国性的武装抗战。中国抗日救亡斗争在七七事变前还处于向“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①,直接对日抗战,与抗日救亡斗争相关,中国面临着争取国内统一的迫切任务,这是发动全面抗战的必要前提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固然是由日本的入侵直接造成的,但这场危机的产生和深化又与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30年代初中国内战分裂未休;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西南与南京对峙;各地实力派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国共两党围剿反围剿战争不断扩大。这种状况成为日本入侵的可乘之机。九一八事变正是在日本断定中国目前“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5页。

恐难作出强力反应”^①的情况下发动的。其后，日本在实施其每一个新的侵略步骤时，也无不在充分利用中国的分裂，忽而要对西南“秘密给予援助，使能与中央对抗”^②，忽而要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施策”。^③对国共对立，日本更是极尽挑唆之能事，蓄意陷中国于无休止的内乱之中。

中国的分裂不仅成为日本入侵的重要诱因，而且严重阻碍着中国对日抗战的发动。七七事变以前，中国也曾进行过几次局部性的武装抗战，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过几纸对日抗战宣言。但受国内分裂内战的制约，多半是自发的、局部的有限抵抗，未能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

内乱诱发外患，进而加剧外患的严酷现实，尖锐显示出国家民族的统一对于抗日救亡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人民深切感受到，要克服这场危机，贫弱的中国要想战胜强敌，非经统一凝聚起全民族力量不能为功。这一点在“九一八”后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尽管具体的抗日救国主张不尽相同，但是对抗战有赖于统一、统一才能御侮、统一是抗战的首要前提的认识，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九一八”后，中国社会各界、各派政治势力均逐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统一问题。不仅绝大多数中间势力如此，而且国共两党也是这样。

“九一八”后，广大中间力量在政治上空前活跃，各界人士、各类社会团体纷纷就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献计献策。1931年12月1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向全国发表宣言指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拯救民族灾难的“入手关键，要视乎我国民之能否团结一致”，呼吁“自今日始，举党与党，党与民，民与民，自伐自侮之病根，一扫而除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② 1933年3月20日，关东军《对支政策》，《蒋总统秘录》（10），台北中央日报社版，第33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